

《闪闪的红星》能否为芭蕾舞“中国学派”探寻新路径？

■本报记者 宣晶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踏着《红星歌》慷慨激昂的旋律，上海芭蕾舞团携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于10月5日至6日亮相上海大剧院。故事从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徐展开，儿时记忆与成年后的战斗相交织，让他更坚定信仰，愿意为守护千千万万家庭而奋斗。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相结合，革命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古典芭蕾元素和民族舞蹈的思想相结合，该剧不仅让上海观众耳目一新，也引起中国舞蹈界的关注。

近年来，红色题材芭蕾舞剧的创作进入“丰产期”，这不仅为“文化走出去”寻求更明晰的“中国标识”，同样也回应着时代需求，展现了当代中国之面貌。“在芭蕾民族化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建立‘中国学派’。所谓‘中国学派’就是充分运用古典芭蕾技术，并将之‘化’开来与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结合，最终融入舞蹈创作中。”著名舞蹈家、编导舒巧认为，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是其中最接近古典芭蕾艺术本体的一次尝试，对于芭蕾舞“中国学派”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

以古典芭蕾美学讲好中国故事，抒发文诗般的浪漫情怀

西方芭蕾经过数百年发展，形成了意大利、法兰西、俄罗斯、丹麦、英国、美国等不同学派，任何一个学派都和自身民族性格紧密结合。从剧目创作来说，自上世纪50年代芭蕾进入中国，中国舞蹈界就开始了特色之路的探索。50多年来，中国芭蕾从经典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奠基年代，发展到芭蕾舞与现代舞结合的“现代派”，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创新之路。在舒巧看来，如今芭蕾民族化站在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上海芭蕾舞团携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从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徐展开，儿时记忆与成年后的战斗相交织，让他更坚定信仰，愿意为守护千千万万家庭而奋斗。

制图：冯晓瑜

段的入口处，而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为今后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首演于2018年10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目前已在全国巡演近110场。“芭蕾舞剧有其自身独特的表现形式，如何以古典芭蕾美学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将中国人的价值观通过芭蕾艺术传递到世界各地，《闪闪的红星》正在探索一条新路。”这部舞剧的编导兼编剧赵明告诉记者，该剧力求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段找到中国军人形象和古典芭蕾体系的契合点。

在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的创作提纲要上，列着中国故事世界化、民族元素时尚化、古典技巧现代化、革命体现艺术化、自然素材浪漫化等重要艺术课题。循着这种艺术思路，《闪闪的红星》调和艺术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舞剧里的“映山红”“红五星”等意象被赋予了人格化表达，抒发了散文诗般的浪漫情怀。“用芭蕾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美学思想，还得有中国虚实相生的意境。”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一级演出监督宋官林认为，《闪闪的红星》

是向古典芭蕾的主动回归，呈现出现实主义与虚拟空间的互相交融、写实与写意手法的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外艺术风格的交流互鉴，丰富了中国芭蕾舞剧的美学精神。

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润物细无声”地传递信仰力量

如何将芭蕾舞剧的美学概念与中

国人的民族气节、信仰力量结合，是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创作的难点之一。剧中，主人公的童年和成年跨时空交错，记忆与现实交织，让母亲的精神力量陪着潘冬子一路成长。这种多维空间的表现手法，带有电影蒙太奇的意味。“《闪闪的红星》印证着上芭致力于探索中国芭蕾创作的初心，它以当代精神、芭蕾语汇、海派风格重新演绎了红色经典。”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专家认为，中国芭蕾的创作应具有

鲜明的时代感，刻画伟大的时代精神。新时代的中国芭蕾不仅要讲述中国故事，还要进一步探索用国际语汇表达当代中国的人文思考与精神情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苏亦对剧中的“红星舞”“映山红”“竹排舞”等舞段印象颇深，她认为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不仅带来了美的享受，也传递了真挚的情感，有着“润物细无声”的动人力量。“在剧中，红军战士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他对亲人的思念交织融合，升华为信仰的力量和牺牲精神，具有更宏大的思想情怀。”

20年前，编舞家赵明创作的舞剧《闪闪的红星》用肢体语言讲述了革命故事；20年后，他的芭蕾舞新作又从精神层面回望主人公潘冬子的成长历程。“我将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革命的感悟放在潘冬子身上，这部剧是我在创作道路上必须闯过去的‘坎儿’。”

赵明告诉记者，为了让舞剧结构更明晰、情感表达更丰沛，他不仅大刀阔斧地修改舞段，甚至一度将这部寄托了激情和热情的作品拆散重塑。“在几番修改中，我静静地坐在台下，完全从观众角度重新审视这部作品，总会萌生新的灵感与激情。”据悉，此次在上海大剧院呈现的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已是第八稿。

主创团队执着的艺术追求、超人的毅力勇气也激励着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剧中潘冬子的饰演者、上芭首席明星吴虎生是当今中国最顶尖的青年舞蹈家之一。这次，擅长古典芭蕾的他打破了过往的表演方式，不仅像真正的战士那样匍匐、下蹲、倒地，更用丰沛的表演将观众带入舞剧情境中，台上台下共同倾情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一个既经典，又颠覆了经典的角色。”吴虎生表示，“站上舞台，扛起枪，中国人的热血就沸腾起来了，饱满的人物情感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倾泻而出。”

73岁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摘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

“爆冷”背后，他提升着东非文学的世界“能见度”

■本报记者 许畅

北京时间7日19时，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73岁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摘得奖项，获奖理由是“因为他对殖民主义文学写作的影响，对难民在不同文化大陆之间鸿沟中的命运有着坚定及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古尔纳的作品对国内读者而言，目前仅2013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收录翻译了两则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

书评人宗城认为，看似“爆冷”的背后，给予了学界和读者重新审视打量非洲文学的机会，真正将少为人知但杰出的文学作品引入大众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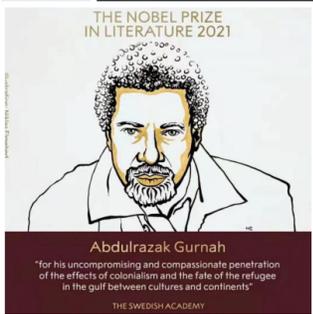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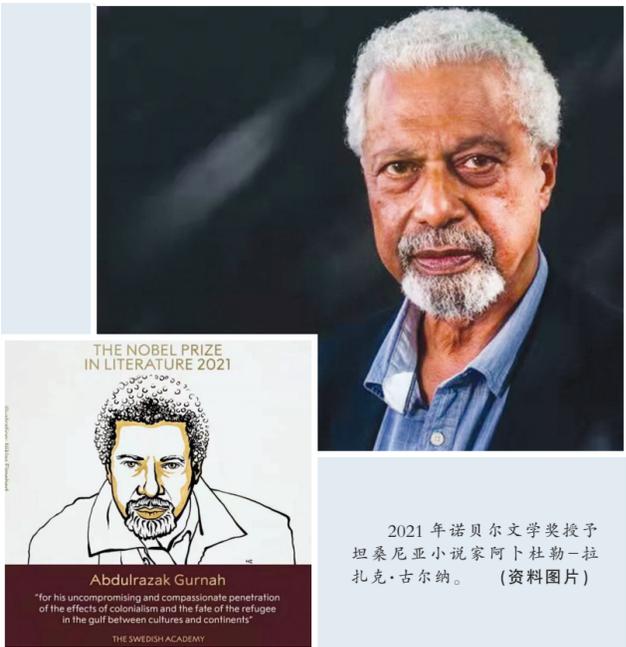
“英语文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被看作是英美文学，非洲基本被忽略。其实，作为非洲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国际上声名鹊起的非洲英语文学，它独特的文化蕴含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朱振武认为，古尔纳正是有创作自觉、文化自觉的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作家之一，他以文学书写提升被遮蔽的东非的“能见度”，打破非洲单一固化的刻板状态，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

游离于中心与边缘，他多年反思殖民地人民生活困境

作为非洲裔英国移民作家，古尔纳的作品空间上跨越三大洲，时间上跨越殖民前后，既描述殖民地人民的生活现状，也讲述非洲人移民到英国寻找归属感的历程，生动呈现后殖民时代“夹心人”的生存现状，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而这与古尔纳的人生动荡经历息息相关，他1948年出生于印度洋上的桑给巴尔岛，1960年代作为难民来到英国。从1980年到1982年，古尔纳在尼日利亚卡诺的巴耶罗大学任教，目前在肯特大学教授文学，同时担任英国文学杂志Wasafiri副主编。他的作品持续关注身份认同、移民和创伤问题，目前共出版十部小说，代表作包括《天堂》《荒漠》《碎石之心》等。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后殖民写作和与殖民主义有关的论述，特别是与非洲、加勒比和印度有关的论述。

古尔纳笔下的虚构人物不断为自己构建新的身份以适应新的环境，移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资料图片)

民和流离失所是小说核心。比如，《离别的记忆》分析了主人公决定离开非洲沿海小村庄的原因。《朝圣者之路》描述来自坦桑尼亚的穆斯林学生移民到英国小镇后如何与狭隘种族主义文化斗争。《赞美沉默》的匿名叙述者逃离了桑给巴尔的统治，在英国开始新生活。“古尔纳对真理的执着和对简单化的厌恶是惊人的，这使他变得黯淡而不妥协，同时他以极大的同情和坚定的承诺追随个人的命运。他的小说回避了刻板的描述，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东非，这是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不熟悉的。在古尔纳的文学世界里，一切都在变化——记忆、名字、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项目无法在任何确定的意义上完成。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种求知热情驱使的无休止的探索。”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的点评，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古尔纳的文学价值。

非洲文学版图仍存诸多盲点，值得重新打量

谈起非洲文学，不少人脑海中跳出的，多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

哥、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或是南非作家库切等寥寥几位名家。有观点认为，非洲文学版图对读者来说，仍存诸多盲点；对于不少非洲作家来说，为本土读者写作的动力远远不如为西方读者写作的动力大，甚至出现了“非洲文学只在塞纳河或泰晤士河两岸出版”的现象。

古尔纳的获奖，在一定程度上令人们思考殖民主题在艺术表现上的可能性。毕竟，非洲文学的发展与非洲大陆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斗争与挣扎相辅相生，一部非洲文学史，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被殖民史”。

而如果将视野拉远，古尔纳的作品颇具前瞻性地道出了全球化之下的流动隐忧。“古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在外国文学研究者张峰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流散的意思不仅是犹太人的亡国、离土和飘零或因人口贩卖带来的强迫移民，更重要的是指代一种跨国流动现象，它包括多方向的文化迁徙和混杂，以及占有不同文化空间的能力。

让跨越代际的温情，驱散“家”中的孤独疲惫

B站推出首档忘年共居观察纪实真人秀《屋檐之夏》

■本报记者 汪荔诚

独居老人和来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本身少有交集，这两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迥异的群体机缘巧合地共处在一个屋檐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前段时间登陆B站的真人秀综艺《屋檐之夏》大胆作了尝试，该节目采取“真人秀+观察室”的模式，在中国老龄协会指导下，邀请3位独居上海、阅历丰富的人生前辈，与几位沪漂青年，开启一场为期21天的代际共居体验。

这一尝试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首期节目的播放量超过了197万，目前在B站上的观众评分是9.8。业内人士表示，节目一方面聚焦隔代人的处事行为、交流习惯等多方面的碰撞，展现代际差异；另一方面让双方走近并理解对方的世界，努力创造出个城市中无血缘、有亲情的“家”，彰显着跨越代际的人文情怀。

观察伴随体验，聚焦两代人的孤独和困境

消除孤独感，是节目中始终贯彻的主旨之一。白发苍苍历尽千帆，独居空房时感叹余生谁伴。独居老人大多非常寂寞，即便是名人也不例外。从《庭院深深》中的深情少女到《甄嬛传》中的太后，演员刘雪华在荧屏上塑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现实生活中的她已经独居近十年。遛狗、看电视、和姐姐打电话是她一成不变的生活常态。“其实一个人住别的都不怕，万一有一天你不小心摔倒了，是没有人知道的。”刘雪华也有苦衷。

身穿格子衬衫塞牛仔褲，梳着精致的油头，再配上一副金丝眼镜，耄耋之年的老人朱增德精神矍铄，让身为“室友”的B站《非正式会谈》意大利代表阿雷

猜测他才到花甲之年。当儿女环绕，孙辈承欢膝下成为有些遥远的梦时，朱增德选择主动重新构建人生圈子，对自我生活进行积极的自救适应。但是在适应的过程中，内心也有苦楚。

节目中有个名为屋檐晴雨灯的环节，每位房客可以调节小夜灯的颜色来表示自己心情。

白日里健谈爽朗的朱增德，将灯的颜色调成了蓝色雨天，心情不言而喻。相比老人，年轻人初登职场热忱追梦，夜深人静时满身困惑疲惫，在异乡打拼的年轻人，孤独感也尤其强烈。阿雷因为疫情缘故不便回国，在节目中曾多次表达对故土的思念和在异乡的孤独。

不同组合的嘉宾在同一屋檐下体验生活的时候，B站UP主“中国BOY超级大猩猩”“泡芙嘴-PUFF”、明星齐思钧、配音演员姜广涛、情商研究专家张怡筠等节目观察室常驻嘉宾，歌手阿云嘎、配音演员葛平观察室飞行嘉宾都以不同视角解析节目内容。通过观察职业差异、文化差异大的隔代人共居，了解两代人的孤独与困境，探讨代际关系的同时，也探索一种未来新的生活方式。

打破壁垒鸿沟，给隔代人内心注入温情

朝气蓬勃的B站UP主拉宏桑将关于自己名字和职业的解释提前打印成了纸张，念给刘雪华听，身为“琼女郎”的刘雪华没有告诉这位Z世代年轻人自己演员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老人和她在屋檐下相处，二人之间的氛围逐渐从略微尴尬到无比融洽；阿雷的身世和经历让上海“老克勒”朱增德连连大呼东西方文化差异……该节目的组合设计独具匠心，三位独居上海的人生前辈为沪

漂青年提供住所，青年们则需要挪出一定时间与精力陪伴、照顾前辈。

刘雪华早上6点已经习惯性地坐在电视机前，拉宏桑却还在熬夜“修仙”创作追剧，阿雷则已经进入了“回笼”模式——不同时代的人的作息差异在镜头前一览无余。除了作息，陌生隔代群体之间饮食差异、交流习惯、处事行为、价值观念也随着屋檐下的生活逐渐显露出来。纵然有差异，老人的睿智和温和也成为了二人相处之间的润滑剂——拉宏桑也不再将想要讲的话写下来照着读，耐心地向刘雪华解释何为UP主，将自己做的视频投屏分享给刘雪华观看，还开玩笑地编造双胞胎姐姐的故事以此来解释视频里同屏的两个自己……随着不断的沟通交流，两个生命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近，刘雪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调皮的拉宏桑就是小时候的她。

与此同时，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现的共同的兴趣爱好也让隔代人打破了原有的壁垒和鸿沟，刘雪华初期担心自己的爱犬会和拉宏桑，没想到对方十分喜欢狗，爱犬成为了二人共同的兴趣话题；无独有偶，阿雷和朱增德一起切磋茶艺、探讨奢侈品销售，如亲人一般地相处……点滴的温情在屋檐下流动着。

近年来，诸如《忘不了餐厅》《花样实习生》《老闺蜜》等老年群体、聚焦老年人生活状态的综艺不断涌现，打破了观众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让老年群体焕发出时代光彩。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一类节目不仅要彰显人文情怀，将价值引导与情感关怀、生命关怀融入其中，充分唤起老年观众积极的生活信念，激发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动力和勇气，还要通过增强节目的参与感、陪伴感，强化互动体验，让更多老年观众能够和家人共同观赏，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增进亲情和相互理解。



从《庭院深深》中的深情少女到《甄嬛传》中的太后，演员刘雪华在荧屏上塑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现实生活中的她已经独居近十年。遛狗、看电视、和姐姐打电话是她一成不变的生活常态。